

农民工寄回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研究*

Relationship between migrants' remittance and life satisfaction

□邓东升 褚荣伟

摘要：农民工寄回一方面降低了其在城市的生活质量，另一方面却通过寄回完成对家庭成员的责任，这种基于寄回的联结方式提高了他们生活的满意度。针对这种可能的抵消效应，本文以在沪农民工为例，验证了其寄回水平与主观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基于生活满意度数据离散的特性，我们采用了 Ordered Probit 模型，寄回作为影响生活满意度的一个关键解释变量。实证结果显示寄回对于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影响”，寄回的边际效应与自身的主观幸福是相关的，每 1000 元的寄回导致主观幸福增加 10% 的可能性从减少-2%到增加 1.8%递增，并且这种作用是稳定的，不受收入的影响。这种正影响依赖于农民工的人口统计与心理状态等异质性特征，这些调节作用可以通过寄回的不同动机来解释。

关键词：农民工；生活满意度；寄回；动机；Ordered Probit 模型

一、引言

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农民工”这类人群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作为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坚产业工人力量，创造了“中国制造”的世界奇迹，但是却无法分享经济发展后的成果。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来考察这类“沉默的群体”的福祉水平(Chu & Hail, 2013; Nielsen et al., 2010)。农民工群体最大的特点是由于户口的约束，其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工作或生活，同时却将部分家庭成员留在了农村，从而家庭的异地分离是他们典型的生活状态。在个体层面，寄回的决策是农民工的重要决策之一，外出农民工需要寄回一部分收入以支持家庭成员的生活，盖新房或翻新房屋、农业投入、生活消费、教育、偿还债务、储蓄和结婚花费成为寄回后的主要用途 (Fan 2004)，然而寄回的钱越多，事实上会降低他们在城市里的生活条件，这种降低的生活条件使得他们融入城市的资源越发稀缺。但人们普遍认为，外出打工是改善家庭关系最好的甚至是唯一的方式。这种改善关系的手段就主要可能是通过寄回，或者通过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希冀。在国家层面，移民的寄回对于国家经济的发展也非常重要。2008 年，移民的汇款总额占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 2%，占低收入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 6%。在几个低收入小国（塔吉克斯坦（48%），吉尔吉斯共和国（31%），尼泊尔（25%），莱索托（25%），摩尔多瓦（24%）），汇款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五分之一，成为其外汇收入的最大来源(Tuck-Primdahl, 2013)。国际移民的汇款可降低其母国的贫困水平，通常也可增加人力资本积累，增加卫生和教育支出，更便于获得信息通信技术，使私营企业更多地参与(Tuck-Primdahl, 2013)。因此农民工的寄回可以改善自

邓东升，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褚荣伟，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己家人的生活条件，同时这种汇聚而成的汇款也可以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27]。针对外出农民工是否寄回或者如何寄回的研究当然非常有价值，但经济学家宏观的分析却往往忽略了微观动力的解读，而已有的微观层面的经济学研究则基于理性人的假设。考虑到外出农民工在城市里所遭受的各种不愉快经历，而且因为户籍而带来的不同的社会区隔，对于农民工寄回的研究应该要放在一个更大的视角下探索，本文则试图从“主观”生活质量的角度来阐释外出农民工如何牺牲当下的城市生活，增加寄回来提升总体的生活满意度。

二、文献综述与假设提出

农民工汇款是指外出打工农民工向农村的资源转移，它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形式：1、通过邮局或银行寄给家乡亲人的款项和物品；2、托熟人转交或亲手交给家乡亲人的款项和物品；3、农民工回家探亲时为家里支付的各种款项，例如水电费、电话费、土地承包费、家庭应酬费、家庭债务；4、家庭成员到农民工打工地探亲时，农民工为其支付的所有开支，例如食宿费、交通费等；5、农民工为家乡的公益事业捐献的财务，例如为家乡修桥、铺路、救助失学儿童以及贫困村民等捐献的款项与物资(罗芳, 2007)。目前没有研究就这些不同的寄回分布状况以及作用进行区分，因此本文并未采纳如此宽泛的定义，而使用的“寄回”则是狭义地界定为外出农民工寄回给家里的款项。这些款项将如何被使用（支付日常生活开支，供子女读书，捐献等）不加以区分。

经济学视角自新迁移经济学(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 NELM)提出以来(Stark, 1991; Stark & Bloom, 1985)，重点讨论劳动力迁移对输出地经济发展的影响(Taylor & Martin, 2001)，新迁移经济学认为，劳动力迁移决策不是由独立个体而是以家庭为决策单位做出的，劳动力迁移是家庭为克服由市场缺失或者低效带来的信贷、保险约束而进行的融资或风险分散行为，由迁移带来的汇款收入则是实现这种自我融资及自我保险的主要手段(Stark, 1991)。虽然这种研究并未得到一致的结论。

针对移民汇款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也是这一领域的重要内容。一部分因素宏观因素（数据为宏观时间序列数据），一部分是微观个体的因素（数据为横截面数据）。具体来说，微观方面，Rempel 等人的研究(Rempel & Lobdell, 1978)和 Johnson, Whitelaw 对肯尼亚的研究(Johnson & Whitelaw, 1974)，Mohammad 等人对巴基斯坦的研究(Mohammad, 1973)以及 Lucas, Stark 对博茨瓦纳的研究(Lucas & Stark, 1985)所得到的结论比较一致，认为移民的个人收入对汇款有正的影响；老家孩子的数量对汇款有正的影响；妻子在外（也即一起外出打工）对汇款数有负的影响，这些研究还考虑了的变量有教育年限，移民年限，拥有财产数(Lianos, 1997)。宏观方面，结论并不一致。Lianos 使用希腊的国际汇款数据对寄回进行实证分析，考虑影响寄回的因素主要有自己收入，家庭收入，汇率，通货膨胀率，利率(Lianos, 1997)。Glytsos(Glytsos, 1988), Katseli 与 Glytsos(Glytsos & Katseli, 1986)和 Swamy(Swamy, 1981)也研究了在希腊的国际移民，得到共同结论是：移民的人均产出和希腊利率对汇款具有显著的正影响，其他一些因素，比如希腊人均产出，通胀率，汇率对汇款并没有一致的影响。而 Wahba 对埃及的研究表明汇率差对汇款有负影响，国内利率对汇款有正的影响(Wahba, 1991)。Jørgen Carling 从汇款机制、汇款动机以及汇款人与受款人的关系探讨汇款的差异化。并且，就微观因素加总与宏观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Carling, 2008)。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也对农民工汇款或寄回有了一些研究。罗芳利用 Tobit 模型对湖北省武汉市农民工汇款数据进行分析，得到家庭收入水平、配偶是否在家乡、退休后是否返乡、家乡的房产、农民工外出打工时间对汇款具有显著影响(罗芳, 2007)。胡枫、王其文等人利用区间回归模型对农民工汇款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农民工自身收入和老家人非汇款收入，老家耕地面积，农民工年龄对汇款数有显著的正的影响，而农民工的转移成本（比如距离），是否全家一起打工、是否有失业经历、是否接受过大学教育对汇款是负的影响(胡枫、王其文, 2007)。李强通过对 1999 年和 2000 年的两份实证调查结果分析发现，农民工的收入以及农民在外打工年龄对其汇款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李强, 2001)。明娟、张建武利用广东省企业用工情况的数据考察农民工汇款的关键因素发现：迁移目标是汇款量的核心决定因素，有回流意愿的农民工的汇款量明显高于无回流意愿的农民工(明

娟、张建武, 2011)。

对于农民工寄回的动机问题, 国内学者通常借鉴新迁移经济学的理论视角。依据 Stark 和 Lucas 提出的“契约安排”(contractual arrangement) 理论, 认为汇款是农民工与老家达成的一个隐形契约, 用以保持农民工在家的利益(Lucas & Stark, 1985)。较多文献认为是“利他”或者“隐性契约”这两个原因同时起作用的(Brown & Jimenez, 2011; Lucas & Stark, 1985)。李强提出受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的影响, 农民工汇款是一种天然利他性的行为, 而非 Stark 和 Lucas 提出的“契约安排”理论(李强, 2001), 不过作者并没有对农民工汇款的动机进行较为严格的实证分析。胡枫在 2008 年提出利他主义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农民工的汇款行为, 中国农民工汇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外出农民工的利己性(胡枫等, 2008)。罗芳认为农村家庭更注重横向关系而非传统的纵向关系, 并且也认为农民工汇款既有利他动机, 也有利己动机(罗芳, 2007)。明娟、张建武则认为有回流意愿的农民工的利己动机更强, 而无回流意愿的农民工汇款更多表现为利他主义动机和部分偿贷动机(明娟、张建武, 2011)。

农民工的寄回决策可能是矛盾的, 是自我与他人的权衡, 也是短期与长期的平衡。对于寄回和主观幸福之间关系研究文献较为匮乏, 就我们所知, 只有 Alpaslan Akay 和 Corrado Giuliatti 等人通过对中国 2008 年普查结果分析, 得到了寄回对主观幸福之间的正向关系, 并且还深入探讨了寄回的动机问题(Akay et al., 2012)。本文将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同时本研究第一次直接讨论了寄回与主观生活质量之间的正关系存在的边界——农民工的人口统计特征和心理特征。

寄回为什么会带来生活满意度的提高呢? 经济学视角的利他或利己动机解读可以得到心理学的支持。最新的心理学研究发现, 把钱花在别人身上所带来的幸福满足感要大于将同样的钱花在自己身上(Dunn et al., 2008), 因此寄回本身则是将钱花在家人身上, 这种利他动机触发的寄回行为将带来更高的生活满意度, 而如果本应寄回的钱花在自己身上, 带来的满意度更少。另一方面, 汇款的用途有时候是为了积累财富, 为了自己在农村的社会地位得到提升, 或者积累财富为未来的生活做准备, 这种基于未来的视角也同样使得未来花钱比当下花钱能够带来更高的满意度(Dunn et al., 2011), 因此, 本文假设是寄回水平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但是因为个体特征的差异, 这种正向影响有一定的调节条件, 比如 1) 年轻人相比于年长者更注重自己的利益, 而不是家庭的利益(Mujcic & Frijters, 2011)。2) 已婚者相对于未婚者更关心家庭利益, 而不是个人利益。3) 教育水平的提高将更加重视对家庭角色的认知。4) 如果是独生子女可能更加容易考虑自身的利益。关心自己还是关心家人的倾向差异对汇款能够带来生活满意度的变化具有调节作用。具有利他倾向的个体较利己倾向的个体来说, 汇款能够带来更高的生活满意度水平, 因为同样单位的汇款给家人而不是花费(储存)在自己身上能够带来更高的满意度。

三、数据收集及基本分布

(一)、数据及变量说明

据第六次人口普查, 上海市常住人口约为 2300 万人, 年平均增长率为 3.24%, 其中, 外省市来沪常住人口约为 900 万, 年增长率为 9.99%。本文分析使用的数据是根据 2011 年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上海外来农民工情况调查^①的调查数据。这个数据集共有 1186 条有效记录。其中调查对象来自于 26 个省市自治区(除 1 个来自于上海市), 并且, 这些受访者来自于上海 18 个区县, 因此, 能够很好地代表上海外来农民工的总体。Alpaslan Akay 和 Corrado Giuliatti 等人使用了 4675 条记录分析寄回对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Akay et al., 2012)而言, 但是其数据没有控制流入城市(未考虑流入城市的差异), 可能不能够厘清农民工的寄回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因为不同的城市对于农民工的政策和社会环境存在显著的差异, 中小城市更容易接纳外来农民工, 不是在大城市的农民工其幸福度越高。表 1 列出本文使用的变量以及变量解释。

表 1 各变量含义解释

变量名	解释说明
SWB	个人在问卷调查中报告的生活满意度，取值 1-10，
Remittance(CNY)	个人寄回、带回（如用于赡养、直系亲属）
Age\Age Sq.	年龄以及年龄的平方
Female(d)	性别的虚拟变量，其中 D=1 表示女性，D=0 表示男性
Married/Divorced/Widowed	已婚/离婚/丧偶的虚拟变量，D=1 表肯定，D=0 表否定
Years Since in SH	累计在沪时间（年）
Jobs	在上海打工份数
Only child(d)	独生子女的虚拟变量，D=1 表示是独生子女
Years of Education	教育年限，取值在 1-16 之间
General insurance	是否参保综合保险虚拟变量，D=1 表示是，D=0 表示否
Urban/Rural insurance	是否参保城保、农村养老保险的虚拟变量
Medical insurance	是否参加合作医疗虚拟变量，D=1 表示是，D=0 表示否
Family Number in SH	一家在沪共同消费的人数
Anticipation	对未来生活的预期得分，空值表示受访者未表态或不清楚
Self-identity(d)	个人归属认同，D=1 表示仅认为自己是外地人，D=0 其它
Migrant identity1/2/3	农民工身份认同的三个问题的得分
Intrinsic/Extrinsic	追求的幸福的生活状态在外在和内在方面的得分
Labor income(CNY)	个人月收入
Other income(CNY)	家庭在沪月总收入 - 个人月收入
Average income(CNY)	各受访者老家农村平均月收入 [®]

（二）、主观幸福的测度

已有文献对主观幸福(Subjective Well-Being)都有了比较多的探讨，也有很多的代理变量来衡量个体的主观幸福。一般都是基于“幸福，快乐”，“生活满意度 (life satisfaction)”(Helliwell, 2003)，以及“精神健康”(Frey & Stutzer, 2002)，使用这些作为主观幸福度的代理变量。比如 Alpaslan Akay 和 Corrado Giulletti 等人的主观幸福就是采用了 12 个标准的一般健康问题 (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然后对这十二个问题的答案评分 (0-3)，最后累加得到 SWB 的代理变量 (GHQ-12)。但考虑到农民工的知识水平以及对调查问卷的理解水平，我们这里采用了单一的“生活满意度”调查。问项的设置如下：“您目前生活满意度是 (1-10 分表示，10 分为最佳，不表态 0)”，采取这种简便的区间选择方式一来可以便于农民工回答，另外该方法的有效性也已经被证实(Anonymous, 2013)。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将不表态的这部分受访者剔除了 (13%)。这里我们认为不表态的这部分人的行为是随机的，而不是因为对生活不满意所做出的消极行为，在这种假设下，剔除的数据对结果并没有影响。剔除之后的数据为 1031 条记录，图 1 是生活满意度的分布情况。从图中，我们看出，大多数人对自己的生活还是比较满意的，对自己生活十分满意或者很不满意的人还是比较少的，这一点和 Alpaslan Akay 的结果很相似(Akay et al., 2012)，生活满意度取值最多为 5-8。

（三）、数据的统计汇总

表 2 中报告了研究中选定的一些比较重要的变量的统计量，其中还分别依据是否寄回进行了分别统计（附录 A 中有我们本文所用到的所有变量的统计量）。

在我们样本中，男性受访者多于女性。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在 35 岁左右，平均教育年限在 10.14 年(学历平均介于初中和高中之间)。被试在上海打工平均时间在 8 年左右，超过 3/4 受访者为已婚。而受访者均有 2-3 个家人(含自己)一起同在上海。并且大家都比较乐观，对未来预期都比较高。注意到，寄回的平均值为 543.11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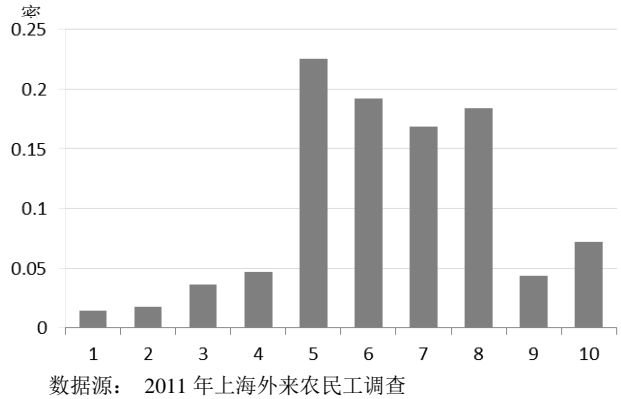


图 1 上海外来农民工 SWB 的分布图

62%的受访者有汇款给老家人（我们称之为寄回群体），38%受访者没有寄回（类似地称为无寄回群体），这两个群体特征的差异在统计性上都是显著的^③。寄回群体的生活满意度比无寄回群体高 0.34 左右($t=-2.7935, p=0.0053$ ^④)，但彼此的满意度相差并不大，因为每个人都有让自己获得幸福的方式，不管是把自己收入用来自己消费还是寄回给老家。相对地，寄回群体平均年龄显著地比无寄回群体年龄大 1.8 年($t=-2.9936, p=0.0028$)。寄回群体显著地比无寄回群体在上海打工时间长 1.6 年左右($t=-4.0819, p=0.0000$)，这和我们认为，随着年龄增加（打工时间和年龄正向关系），一个人更加认识到自己对老家的责任，更愿意把收入寄回给老家是一致的。并且寄回群体更多的是已婚者，寄回群体已婚比例比无寄回群体比例高 13%，已婚者更加重视家庭，关键是因为有子女，更需要履行家庭的契约。寄回群体的工资收入也相对较高，因为当自己收入能够维持自己目前的生活，而且没有其他顾虑会更加愿意汇款给老家。

表 2 统计汇总

变量	所有 (#Obs 1186)		有寄回(#Obs 736)		无寄回(#Obs 450)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SWB	6.39	(1.92)	6.52	(1.91)	6.18	(1.92)
Age	34.35	(9.73)	35.03	(9.24)	33.25	(10.39)
Female(d)	0.37	(0.48)	0.34	(0.48)	0.42	(0.49)
Married(d)	0.76	(0.43)	0.81	(0.40)	0.68	(0.47)
Number of Children	1.05	(0.85)	1.14	(0.82)	0.90	(0.87)
Years of Education	10.14	(2.93)	10.09	(2.73)	10.21	(3.23)
Years since in SH	8.12	(5.55)	8.62	(5.68)	7.29	(5.25)
Labor income(CNY)	2724.7	(1092.9)	2848.5	(1144.8)	2522.3	(970.2)
Family Number in SH	2.31	(1.25)	2.28	(1.19)	2.36	(1.35)
Anticipation	4.25	(0.74)	4.25	(0.74)	4.25	(0.75)
Remittance(CNY)	543.11	(678.42)	875.18	(671.58)		

注：SWB 使用的是“生活满意度”，取值为 1-10，其中，10 表示非常满意。变量后(d)表示 d 为 0-1 变量。预期取值 1-5。汇款(remittance)以元为单位。

四、估计方法

在这部分，本文将给出我们的回归模型。因为主观幸福选用的代理变量是“生活满意度”，这个指标取值范围在 1-10，是顺序变量，而且是离散变量，因此我们采取了更适合的模型——有序 probit 模型 (ordered probit model) (Akay et al., 2012; 陈强, 2010)。实际上，OLS 和 OPM 得到的结果很相似。因为回归系数代表的含义相差很大，所以两个回归模型的回归系数大小并没有比较意义。但是，相同的变量的回归系数的显著性和正负性都是一致的，更详细地，参见附表 A.4 中 OLS 回归的结果。

我们假设 $y^* = \mathbf{x}'\boldsymbol{\beta} + \epsilon$ (而 y^* 不可观测)，对于 y 的取值有如下规则

$$(1) \quad y = \begin{cases} 1 & \text{if } y^* \leq u_1 \\ 2 & \text{if } u_1 < y^* \leq u_2 \\ 3 & \text{if } u_2 < y^* \leq u_3 \\ \dots & \\ 10 & \text{if } u_9 < y^* \end{cases}$$

其中， ϵ 为误差项，服从标准正态分布 $N(0,1)$ 。 $\mu_j (j=1,2,\dots,9)$ 为待估计参数，被称为切点 (cut points) (陈强, 2010)。

下面计算 $y=1$ 的条件概率

$$(2) \quad \begin{aligned} P(y_i = 1 | \mathbf{x}_i) &= P(y_i^* \leq u_1 | \mathbf{x}_i) = P(\mathbf{x}_i'\boldsymbol{\beta} + \epsilon_i \leq u_1 | \mathbf{x}_i) \\ &= P(\epsilon_i \leq u_1 - \mathbf{x}_i'\boldsymbol{\beta} | \mathbf{x}_i) = \Phi(u_1 - \mathbf{x}_i'\boldsymbol{\beta}) \end{aligned}$$

其中 Φ 为标准正态分布的累积分布函数 (CDF) (Jackman, 2000)，类似计算有

$$(3) \quad P(y_i = j | \mathbf{x}_i) = \begin{cases} \Phi(u_1 - \mathbf{x}_i'\boldsymbol{\beta}) & j = 1; \\ \Phi(u_j - \mathbf{x}_i'\boldsymbol{\beta}) - \Phi(u_{j-1} - \mathbf{x}_i'\boldsymbol{\beta}) & j = 2, 3, \dots, 9 \\ 1 - \Phi(u_9 - \mathbf{x}_i'\boldsymbol{\beta}) & j = 10 \end{cases}$$

为了估计这个模型，我们使用极大似然估计 (MLE)，因此，我们需要构造极大似然函数 \mathcal{L} ，借助示性函数 z_{ij} (当 $y_i = j$ 时，取值为 1，其余为 0)，得到对数似然函数为

$$(4) \quad \ln \mathcal{L} = \sum_{i=1}^N \sum_{j=1}^{10} z_{ij} \ln \{ \Phi(u_j - \mathbf{x}_i'\boldsymbol{\beta}) - \Phi(u_{j-1} - \mathbf{x}_i'\boldsymbol{\beta}) \}$$

为了得到解释变量 (如 \mathbf{x}_i) 对被解释变量各种结果概率的边际效应 (Marginal Effects) (Wang & Kockelman, 2009)，我们对 $P(y = j | \mathbf{x}_i)$ 求偏导有

$$(5) \quad \frac{\partial P(y = j | \mathbf{x}_i)}{\partial \mathbf{x}_i} = (\phi(u_j - \mathbf{x}_i'\boldsymbol{\beta}) - \phi(u_{j-1} - \mathbf{x}_i'\boldsymbol{\beta})) \boldsymbol{\beta}_i$$

其中， $\phi(\cdot)$ 为正态分布函数的概率分布函数 (PDF)。

在本文中，最基本的回归模型设定为

$$(6) \quad SWB_i^* = \boldsymbol{\alpha}\mathbf{x}_i + \boldsymbol{\beta}\mathbf{y}_i + \gamma r_i + \epsilon_i$$

其中， SWB_i^* 是第 i 个人的主观幸福的估计值 (不可观测的)，根据 (1) 式提供的规则可以得到问卷调查中的“生活满意度” (SWB)， \mathbf{x}_i 为第 i 个人的人口统计特征向量 (比如性别，年龄，教育年限，婚姻状况等)， r_i 为 i 个人的寄回数 (1000 CNY)， \mathbf{y}_i 为模型考虑的其他变量，而 ϵ_i 为误差项，服从标准正态分布 $N(0,1)$ 。

这里解释变量的系数并不能像 OLS 回归系数一样解释。根据(6)，我们知道系数只能解释为对潜在的主观幸福的影响程度(即系数能解释为对连续变量 SWB^* 的影响程度，而不能直接解释为对离散变量 SWB 的影响程度)，这对观测到的主观幸福并不能很好解释，我们需要通过(5)来计算解释变量对结果的影响概率，也即解释变量的边际效应。

另外，我们还考虑寄回与其他变量的交互作用，我们考虑性别，年龄，收入高低(d)，教育年限长短(d)，是否有小孩在上海读书(d)等选定的特征（构造 0-1 变量）作为交互项。基于上面的基准回归，我们设定含交互项的回归方程为

$$(7) \quad SWB_i^* = \alpha x_i + \beta y_i + \gamma_1 r_i \times D_i + \gamma_2 r_i \times (1 - D_i) + \eta D_i + \epsilon_i$$

其中， D_i 就是我们感兴趣的一些(虚拟)变量 $D_i=0$ 。当 $D_i=1$ 时，寄回的回归系数为 γ_1 ，当时，寄回的回归系数为 γ_2 。对解释变量的边际效应的分析需借助(5)。

基于我们的模型，我们可能需要考虑内生性问题。比如，反向因果性，寄钱回家对一个人的幸福感有影响，相反，一个人的幸福感更高，也有可能导致他寄更多钱回家(Luttmer, 2005; Pischke, 2011; Powdthavee, 2010)。类似的，其他变量也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比如工资。关于内生性问题，(Akay et al., 2012)认为反向因果性可能比较有限，而以往文献对这个论述的也不多，本文不详细考虑内生性问题（关于内生性更详细地论述，参见上述文献）。

五、实证结果

在本节，我们将首先验证寄回对 SWB 的影响。然后，我们分析该效应存在的可调节变量。

(一)、寄回对 SWB 的影响

首先，我们给出了生活满意度的一个基准回归。本文使用 ordered probit model 对整个样本做了两次回归，先是排除寄回的影响，对模型中的其他变量进行 OPM 回归（模型 I）；然后，加入汇款 remittance（模型 II），考虑寄回对主观幸福的影响。表 3 给出了基准回归的主要结果，更详细的回归结果见附录 B。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I	II
汇款 (Remittance(1000 CNY))		0.102** (0.052)
年龄 (Age)	-0.050 (0.031)	-0.049 (0.031)
年龄的平方 (Age Sq.)	0.001 (0.000)	0.001 (0.000)
女性 (Female(d))	0.124* (0.074)	0.129* (0.074)
已婚 (Married(d))	0.238** (0.121)	0.208* (0.122)
离异 (Divorced/Widowed(d))	0.625** (0.248)	0.582** (0.249)
教育年限 (Years of Education)	-0.024* (0.013)	-0.023* (0.013)

家庭在沪人数 (Family Number in SH)	0.054 (0.034)	0.069** (0.035)
自我身份认同 (Self-identity)	-0.394*** (0.071)	-0.400*** (0.071)
对未来期望 (Anticipation)	0.182*** (0.046)	0.182*** (0.046)
劳动收入 (Labor income)	0.076** (0.033)	0.062* (0.034)

数据源: 2011年上海外来农民工调查, **/**/*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10%/5%/1%。

(d)表示该变量为 0-1 变量, 右两栏括号内数值为标准差。

表 4 显示了两个回归模型所得到的切点。在这里, 切点的数值表示回归得到的主观幸福的处于各个状态的临界值, 比如回归得到的“满意度” (y^*) 处于区间[-0.76,0.82]之间, 则满意度在外在表现(y)为 5。

表 4 基准回归的切点

模型	u_1	u_2	u_3	u_4	u_5	u_6	u_7	u_8	u_9
I	-1.783	-1.463	-1.077	-0.760	0.082	0.632	1.115	1.849	2.142
II	-1.744	-1.422	-1.036	-0.718	0.125	0.676	1.160	1.896	2.189

在讨论寄回的影响之前, 我们先就模型 I 的结果与已有文献的结果进行比较。虽然我们的结果与 Akay 等人的结果不太一致, 但是, 我们看到, 当其他条件给定, 女性的主观幸福要高于男性, 这与之前的文献(Dolan et al., 2008; Ferrer-i-Carbonell & Van Praag, 2003; Frey & Stutzer, 2002)的结论却是很契合的。而且, 以前的研究表明, 主观幸福与年龄之间是 U 型关系(Blanchflower & Oswald, 2004), 我们从 Age 和 Age sq. 的系数可以看出也是吻合的, 只是, 模型 I 和模型 II 关于年龄的两个系数都是不显著的, 这和胡枫等人提出的责任感会随着年龄增加而增强, 导致汇款增加的说法是不一致的。已婚者相对而言觉得自己更幸福(Helliwell, 2003; Kahneman et al., 2003), 收入对幸福感也是正的影响, 这和已有文献的结果也是一致的。注意到离婚或丧偶的系数为正, 这个和样本量有关, 因为这部分群体仅占整个样本的 3%, 本文将其放入回归模型只是为了和已有文献做对比。

除去已有的结论, 我们有如下新的结论。自我认同度 (Self-identity) 对主观幸福有显著的“正的影响”[®] (当受访者认为自己只是外地人的时候 Self-identity=1, 其余取值 SWB 为 0); 积极向上的心态 (Anticipation) 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对个体主观幸福有显著正的影响; 最后, 在沪人数越多, 个体的幸福感越高的可能性越大, 这很可能因为家人在身边减少了对远方的牵挂。

当我们加入了寄回这个变量之后, 我们发现, 寄回的系数显著为正, 这也即寄回对个体幸福感具有正的作用, 但是, 这种作用多大, 我们并不能从系数中看出, 为了探究寄回对主观幸福的边际效应 (即寄回对 SWB 各个取值可能性的影响), 我们利用(5), 取 x_j 为各变量均值, 依次令 j 取值 1-10, 得到了各变量对取值可能性的边际效应如表 5 所示, 需要注意的是, 解释变量的边际效应和被解释变量的取值有关, 而且和自己的取值也有关。

表 5 主要变量对 SWB 的边际效应

变量	边际效应 (%)									
	1	2	3	4	5	6	7	8	9	10
Remittance	-0.3	-0.3	-0.5	-0.6	-2.0	-0.5	0.6	1.8	0.6	1.2
Female*	-0.3	-0.4	-0.7	-0.8	-2.6	-0.7	0.7	2.3	0.8	1.6
Married*	-0.6	-0.6	-1.2	-1.4	-3.9	-0.7	1.3	3.6	1.2	2.3

Divorced*	-0.8	-1.0	-2.1	-2.7	-10.8	-5.3	0.2	8.1	4.0	10.4
Education	0.1	0.1	0.1	0.1	0.4	0.1	-0.1	-0.3	-0.1	-0.2
Urban ins.*	-0.7	-0.8	-1.5	-1.7	-5.4	-1.3	1.5	4.8	1.7	3.5
Family No.	-0.2	-0.2	-0.4	-0.5	-1.4	-0.3	0.4	1.3	0.5	0.9
Selfidentity*	1.0	1.0	2.0	2.4	7.4	1.9	-1.9	-6.5	-2.4	-4.8
Anticipation	-0.4	-0.5	-0.9	-1.1	-3.3	-0.8	0.9	3.0	1.1	2.1
Labor inc.	-0.1	-0.2	-0.3	-0.3	-1.1	-0.2	0.3	0.9	0.3	0.7
Prob.	0.9	1.3	2.8	4.2	22.0	21.1	18.2	19.3	4.3	5.8

*表示 dy/dx 中, x 的变化为从 0 变成 1 的离散变化。Family No. 为 Family Number in SH, Labor inc. 为 Labor income. Prob 为 SWB 取值为 1-10 的概率。

从表 5 中最后一行看出, SWB 取值为 5-8 个可能性最大, 考虑对列各个变量的边际效应, 发现已婚 (Married(d))、离婚 (Divorced(d))、城市保险 (Urban insurance(d))、个人身份认同 (Self-identity(d)) 的边际效应最大, 汇款 (Remittance)、对未来的期望 (Anticipation) 的边际效应适中, 而教育年限 (Education)、劳动收入 (Labor income) 的边际效应最小。因为, 边际效应和 x 的取值有关, 所以, 并不好讨论边际效应的值。我们这里仅对个别数值进行讨论, 当 $j=8$ 时, \mathbf{x}_j 取各个变量均值, 借由(5), 我们得到寄回的边际效应是 1.8% (从表 1.4 中读出), 这也即, 当增加 1 单位的寄回(1000 CNY), $SWB=8$ 的可能性会增加 1.8。类似的, 对于虚拟变量, 如, Self-identity 在 $j=8$ 时的边际效应为 -6.5%, 因为虚拟变量是从 0 变化到 1, 所以, 也就是说, 当自我认同感下降 (因为自我认为是上海的一员取值为 0, 认为自己仅是外地人取值为 1) 导致 $SWB=8$ 的可能性降低 6.5%, 反过来说, 当一个农民工从仅认为自己是外地人到认为自己是上海的一员的时候, 他的主观幸福 $SWB=8$ 的可能性将会提升 6.5%。图 2 给出了各主要因素的边际效应的变化趋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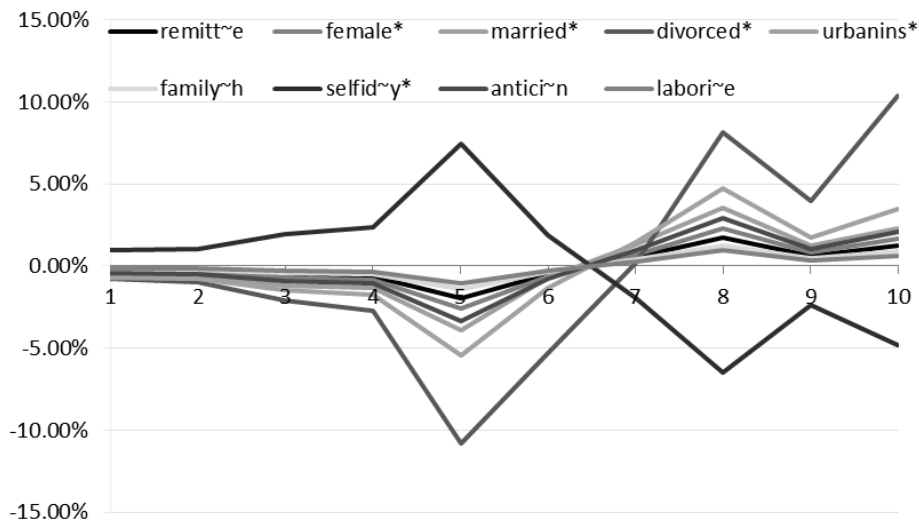


图 2 主要因素的边际效应变化图

这一部分, 我们将转到基准模型里可能对寄回系数产生直接影响的回归变量, 如农民工自己的收入 (Labor income)、家里其他人的收入 (Other income)、当地平均工资 (Average income) 都可能会减小寄回的系数, 这里我们依次对上述变量之间的搭配进行回归, 重点看寄回的系数的变化情况, 表 6 给出了寄回、收入与主观幸福六个回归模型的系数以及显著性和标准差。

从表 6 中得出的结论是, 寄回的系数是显著一致而且为正的, 平均在 0.105 左右, 而且显著性水平在 95%; 个人收入的系数也是很稳定的, 平均为 0.05, 显著性水平为 90%, 而家庭其他人的收入以及个体来源地的平均收

入都是不显著的，但是各个回归系数都是正的，也就是说老家人收入和老家的平均收入水平对于汇款是有正的影响，这个可以用契约安排里面的契约成本来解释。通过这六个模型的回归系数，我们确信我们之前回归模型的正确性，寄回和主观生活满意度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是稳定一致的，并没有因为收入的加入导致出现不显著的情况。

表 6 寄回、收入和主观幸福

变量	I	II	III	IV	V	VI
Remittance	0.123** (0.050)	0.102** (0.052)	0.120** (0.051)	0.101* (0.052)	0.105** (0.052)	0.102** (0.052)
Labor income		0.062* (0.034)		0.058* (0.034)	0.061* (0.034)	0.062* (0.034)
Other income			0.006 (0.020)	0.009 (0.020)		0.007 (0.020)
Average income					0.007 (0.018)	0.007 (0.018)

注：**/**/*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 10%/5%/1%。各个收入都是以 1000CNY 为单位。

(二)、农民工异质性

为了更好的揭示寄回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大小，本小节将根据农民工的特征对其进行分组，分别对不同组的群体进行实证研究。分组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依据人口统计和经济等显性特征^[3]，一类是依据精神心理等隐性特征，看个人的社会、经济、心理特征对寄回的调节作用。

1、社会人口统计特征的异质性

考虑人口统计特征，我们选择如下几个特征：“性别(Female)”、“年龄(age)”“是否已婚(Married)”，“收入高或低(d)”、“教育年限长或短”，“是否为独生子女”。其中，“married=0”指的是未婚、离婚或者丧偶；收入高或低(d)是根据其收入与中等收入的比较得到的一个虚拟变量；而教育年限，教育年限长是指“Years of Education ≥ 9”，据此我们得到了六组 0-1 变量，再根据设定(7)，我们得到表 7 所示的结果。

表 7 农民工社会人口统计特征对寄回系数的影响

Female(D=1)	0.122 (0.086)	Age ≤ 33(D=1)	0.151** (0.073)
Male(D=0)	0.091 (0.065)	Age > 33(D=0)	0.063 (0.067)
Married(D=1)	0.074 (0.060)	Years of education ≤ 9(D=1)	0.140** (0.062)
Single(D=0)	0.192* (0.106)	Years of education > 9(D=0)	0.037 (0.078)
Labor income ≤ 2.5(D=1)	0.132* (0.073)	Only child(D=1)	0.308** (0.144)
Labor income > 2.5(D=0)	0.078 (0.067)	Not only child(D=0)	0.076 (0.055)

首先，对于女性的回归系数要大于男性的回归系数，这和我们之前的基准回归得出女性有更大的可能性显示

出更高的主观幸福感是一致的。这个也很好理解，女性细心、爱家、顾家的天性使得他们提供给老家更多的汇款，天生地拥有更多的家庭责任感，而且，这种责任感带给她们的幸福提升也高于男性。其次，我们讨论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因为，对于收入较低的群体而言，他们需要考虑的是如何用低工资养活自己和给老家的寄回，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寄回相同的钱回家带给他们幸福感的可能性的提升的会高于收入高的群体，而对于高收入群体，他们工资因为比较多，花在其他方面的开销也更大，同样寄回 1000 元钱对他们而言意义并没有那么重大，但是，他们给老家的寄回会比低收入群体更高。

在讨论其他特征之前，我们将它们归为两类，分别是“利己倾向特征”和“利他倾向特征”，其中，“Age<33”、“Single”、“Edu≤9”、“Only Child”为利己倾向特征，反之为“利他倾向”。理由是对于年轻人而言，他们更多的关注自己的发展，自己的消费，而随着年龄增长，他们会更加关注家人的幸福；对已婚者而言，他们成家之后，必然更加关心家里，更愿意为家庭牺牲自己的利益；当教育年限变长之后，他们会更好地认知自己在家里的角色和责任，进而更加关心家人的幸福。

对于利己倾向的群体而言，他们给老家的寄回比利他倾向的群体更少，但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利益看得更重一些，所以，同样是寄回 1000 元给老家，利他主义者这 1000 元对自己无足轻重，因此这 1000 元寄回带给他们主观幸福感的增加也较小，而利己主义者不这么认为，他们愿意给老家相同的寄回，意味着他需要克服一些心理障碍，只有他能够得到更大的积极感受，他才愿意寄回相同的金额给老家，因此相同寄回对他们主观幸福感增加的可能性会更大。

表 8 农民工人口特征利己利他分析

人口统计特征				
利他性特征判断标准	Age<33	Single	Edu≤9	Only Child
利己(Y)	0.151	0.192	0.140	0.308
利他(N)	0.063	0.074	0.037	0.076

2、精神心理的异质性

关于主观幸福的一些文献指出，一些我们看不见的特质也会对主观幸福有比较大的影响，比如个性或者遗传特质(Boyce & Wood, 2011; Diener et al., 1999)。鉴于此，本文考虑几个在心理状态方面的异质性，首先是个人认同 (self-identity)，即受访者认为自己是外地人或者是上海人的一部分。类似这个的变量还有对农民工的身份的认同 (migrant identity) 以及对未来生活的期待 (anticipation)。

利用(7)对上述选定的特质进行回归，得到表 9 所示的结果。

表 9 农民工心理特质以及精神状态特征对寄回系数的影响

Self-identity(D=1)	0.116*	Migrant identity ≤ 3(D=1)	0.124**
	(0.067)		(0.056)
Self-identity(D=0)	0.084	Migrant identity > 3(D=0)	0.009
	(0.076)		(0.105)
Anticipation ≤ 4(D=1)	0.126**		
	(0.062)		
Anticipation > 4(D=0)	0.062		
	(0.078)		

对于 Self-identity(D=1)的人而言，他们并没有完全融入上海的生活，他们认为自己仅仅只是外地人，所以对他们而言，自己消费的效用并不是太大，他们考虑的还是对老家人的支持（比如老家人的消费和在老家的小孩教育等等），他们将会把更多的打工收入寄回给老家，而不是选择用于自己消费，所以对这样的群体而言，寄回的效用将会更大，也就使得汇款增加他们效用的可能性更大，而对那些认为自己已经是上海人的农民工而言，他们会觉得自己在上海的消费相对重要一些，所以他们更多的收入将花费在自己的消费中，而且，他们从寄回中得到的效用也会比那些认为自己不是上海人的效用低。

同样的道理，对于 Migrant identity ≤ 3 的而言，他们认为自己是农民工，对他们而言，并没有必要在上海花费那么多来迎合上海人的生活，所以，对那些人来说，他们会相对节约勤俭，将剩余收入寄回给老家，寄回导致生活满意度（ y^* ）平均增加为 0.124。而对那些认为自己不是农民工的人而言，他们会让自己过得更加体面，他们会注重别人怎么看待他们，所以，他们会花费更多的收入在自我的“包装”和“体面”上，而寄回给他们的效用相对较小，从数据（0.009）中可以看出。

总结起来就是：对于那些认为自己只是外地人，认为自己是农民工的人来说，因为他们并没有觉得自己被这座城市所接纳，自己并不属于上海，他们挂念的还是老家，所以，寄回对他们幸福的影响大于那些认为自己是上海人的一部分，已经融入到上海这座城市，认为自己不是农民工的人。

对于 Anticipation ≤ 4 (D=1)的人而言，他们对未来的期待并不高，他们需要老家的支持来弥补未来的不确定性，所以，对未来期望不高的群体，他们会与老家建立更加强的联系，他们希望在未来打工不顺利的时候，老家能给自己更多的支持，他们也能从寄回中获得更高的幸福感。而对未来比较期待的人而言，他们觉得未来很光明，他们更加乐观地看待未来，认为未来会一帆风顺，可能下意识就会减少和老家的联系，所以寄回对他们的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并不显著。

六、结论

本文以在沪农民工为例实证性检验了寄回对于农民工主观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基于抽样问卷调查的数据，主观幸福数据是离散的，取值在 1-10，我们采用了 Ordered Probit Model，而寄回作为 OPM 的一个解释变量。我们的结果显示了寄回对于主观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影响，这个结果在我们控制各个收入进入模型的时候也是成立的，进一步说明我们的结果的稳健。并且，由于采用 OPM 与 OLS 区别较大(OLS 回归结果参见附表 A.4)，不能直接利用回归系数解释边际效应，我们利用软件计算出了各个变量的边际效应，因为边际效应是和个人的主观生活满意度，解释变量、系数是有关的，所以，我们得到的是边际效应的变化。然后，为了考察农民工的异质性，我们考虑了两组特征变量，分别是社会经济特征和精神心理特征，对各个调节变量构造 0-1 变量，与寄回构造交互项，依次放入模型中，从而发现在不同的群体之中，该效应的呈现不一样。

本文与 Akay 等人的研究得到了相同的结论，即生活满意度和寄回之间的正的关系仍然是成立的，但是，从显著性来看，这种关系已经没有文献(Akay et al., 2012)所得到的那么显著，我们认为，这种减弱源于我们数据对象并没有限定是户主，并且我们的受访对象一家人在上海的人数相对多一点，也就是我们认为寄回对主观福祉的影响在逐渐削弱。并且，从边际效应来看，寄回对主观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是有正有负的，正负性取决于当前的生活状态（禀赋满意度水平）。对于交互项的回归，结果仍然是类似的，不过，本文不仅考虑了人口统计、经济特征，也考虑了精神心理特征在调节寄回对主观幸福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分析是基于 2011 年上海外来农民工的调查，对数据的采集集中在上海，从而控制了移入城市的特征，相比于国内类似研究的数据而言都更加科学。因为生活满意度取值在 1-10，我们在建立模型的时候使用了 ordered probit model，而不是传统的 OLS 回归。

在幸福感问题被广泛提起的今天，理解农民工的主观生活满意度很重要，特别是在当前城乡流动频繁的社会。未来还需要研究农民工寄回对于主观生活满意度的内在机制，尤其是内生性问题需要解决，同时不同的寄回

目的也可能会影响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也值得深入分析。

注释

- ①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1] 97 号。
- ② 数据来源：2010 年国家统计局年鉴
- ③ 方法是对两个群体的特征做 Z 检验
- ④ Z 检验的 t 值与 p 值，其中当 p 小于 1% 时意味着两个群体的差异是显著的。
- ⑤ 这里“正的影响”的意义是指该变量正向增加会使主观幸福的取值更大的可能性增加。

参考文献:

- (1) Akay A., Giulletti C., Robalino J. D., Zimmermann K. F., 2012, "Remittances and Well-Being Among Rural-to-Urban Migrants in China",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Forschungsinstitut zur Zukunft der Arbeit.
- (2) Anonymous, 2013, "The Impact of Social Capital On the Wage of Rural Migrants in China: A Study Using Ordered Model with Sample Selection" *Journal of Macromarketing*.
- (3) Blanchflower D. G. & Oswald A. J., 2004, "Well-Being Over Time in Britain and the Us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8(7), pp.1359~1386.
- (4) Boyce C. J. & Wood A. M., 2011, "Personality and the Marginal Utility of Income: Personality Interacts with Increases in Household Income to Determine Life Satisfac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78(1), pp.183~191.
- (5) Brown R. P. & Jimenez E. V., 2011, "Subjectively-Assessed Welfare and International Remittances: Evidence From Tong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47(6), pp.829~845.
- (6) Carling J., 2008, "The Determinants of Migrant Remittances",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24(3), pp.581~598.
- (7) Chu R. & Hail H. C., 2013, "Winding Road Toward the Chinese Dream: The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and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pp.1~12.
- (8) Diener E., Suh E. M., Lucas R. E., Smith H. L., 1999, "Subjective Well-Being: Three Decades of Progres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5(2), pp.276.
- (9) Dolan P., Peasgood T., White M., 2008, "Do we Really Know What Makes Us Happy? A Review of the Economic Literature On th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Subjective Well-Being",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29(1), pp.94~122.
- (10) Dunn E. W., Aknin L. B., Norton M. I., 2008, "Spending Money On Others Promotes Happiness", *Science*, 319(5870), pp.1687~1688.
- (11) Dunn E. W., Gilbert D. T., Wilson T. D., 2011, "If Money Doesn't Make You Happy, then You Probably Aren't Spending It Right", *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 21(2), pp.115~125.
- (12) Ferrer-i-Carbonell A. & Van Praag B. M., 2003, "Income Satisfaction Inequality and its Cause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 1(2), pp.107~127.
- (13) Frey B. S. & Stutzer A., 2002, "What Can Economists Learn From Happiness Research?",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0(2), pp.402~435.
- (14) Glytsos N. P., 1988, "Remittances in Temporary Migration: A Theoretical Model and its Testing with the Greek-German Experience",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124(3), pp.524~549.
- (15) Glytsos N. & Katseli L. T., 1986,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Determinants of International Labour Mobility: A

Greek-German Perspective", CEPR Discussion Papers.

(16) Helliwell J. F., 2003, "How's Life? Combining Individual and National Variables to Explain Subjective Well-Being", *Economic Modelling*, 20(2), pp.331~360.

(17) Jackman S., 2000, "Models for Ordered Outcomes", Political Science 200C.

(18) Johnson G. E. & Whitelaw W. E., 1974, "Urban-Rural Income Transfers in Kenya: An Estimated-Remittances Func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2(3), pp.473~479.

(19) Kahneman D., Diener E., Schwarz N., 2003, *Well-Being: The Foundations of Hedonic Psychology*.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 Lianos T. P., 1997, "Factors Determining Migrant Remittances: The Case of Greec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pp.72~87.

(21) Lucas R. E. & Stark O., 1985, "Motivations to Remit: Evidence From Botswana",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pp.901~918.

(22) Luttmer E. F., 2005, "Neighbors as Negatives: Relative Earnings and Well-Being",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0(3), pp.963~1002.

(23) Mohammad A., 1973, *Temporary Migration of Workers and Return Flow of Remittances in Pakistan*. The Center.

(24) Mujcic R. & Frijters P., 2011, "Altruism in Society: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Involving Commuters".

(25) Nielsen I., Smyth R., Zhai Q., 2010,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China'S Off-Farm Migrants",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11(3), pp.315~333.

(26) Pischke J., 2011, "Money and Happiness: Evidence From the Industry Wage Structur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7) Powdthavee N., 2010, "How Much Does Money Really Matter? Estimating the Causal Effects of Income On Happiness", *Empirical Economics*, 39(1), pp.77~92.

(28) Rempel H. & Lobdell R. A., 1978, "The Role of Urban - to - Rural Remittances in Rural Development",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4(3), pp.324~341.

(29) Stark O., 1991, *The Migration of Labor*. Blackwell Oxford.

(30) Stark O. & Bloom D. E., 1985, "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5(2), pp.173~178.

(31) Swamy G., 1981, "International Migrant Workers' Remittances: Issues and Prospects", *World Bank Staff Working Paper*.

(32) Taylor J. E. & Martin P. L., 2001, "Human Capital: Migration and Rural Population Change", *Handbook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 pp.457~511.

(33) Tuck-Primdahl M. J., 2013, "Migration and Remittances", 2013.

(34) Wahba S., 1991, "What Determines Workers' Remittances?",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28(4), pp.41~44.

(35) Wang X. C. & Kockelman K. M., 2009, "Application of Dynamic Spatial Ordered Probit Model",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Record: Journal of the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Board*, 2136(1), pp.45~56.

(36) 陈强:《高级计量经济学及 Stata 应用》,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年。

(37) 胡枫、史宇鹏、王其文:《中国的农民工汇款是利他的吗?——基于区间回归模型的分析》,《金融研究》,2008年第1期。

(38) 胡枫、王其文:《中国农民工汇款的影响因素分析——一个区间回归模型的应用》,《统计研究》,2007年第10期。

(39) 李强:《中国外出农民工及其汇款之研究》,《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4期。

(40) 罗芳:《外来农民工家乡汇款的影响因素及动机分析——以湖北省武汉市为例》,《中国农村经济》,2007年第S1期。

(41) 明娟、张建武:《回流意愿, 居留时间与农民工汇款》,《农业经济问题》,2011年第3期。

附表 A.1 统计汇总

变量	所有		有寄回		无寄回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SWB	6.39	(1.92)	6.52	(1.91)	6.18	(1.92)
Age	34.35	(9.73)	35.03	(9.24)	33.25	(10.39)
Age Sq.	1274.26	(710.96)	1311.94	(676.69)	1212.58	(760.5)
Female	0.37	(0.48)	0.34	(0.48)	0.42	(0.49)
Married	0.76	(0.43)	0.81	(0.4)	0.68	(0.47)
Divorced	0.03	(0.16)	0.03	(0.17)	0.02	(0.12)
Years since in SH	8.12	(5.55)	8.62	(5.68)	7.29	(5.25)
Years since in SH Sq.	96.69	(131.52)	106.44	(137)	80.73	(120.48)
Number of Jobs	2.38	(1.79)	2.43	(1.81)	2.29	(1.75)
Only child	0.14	(0.35)	0.13	(0.34)	0.16	(0.37)
Years of Education	10.14	(2.93)	10.09	(2.73)	10.21	(3.23)
General insurance	0.37	(0.48)	0.40	(0.49)	0.34	(0.47)
Urban insurance	0.44	(0.5)	0.47	(0.5)	0.38	(0.48)
Rural insurance	0.19	(0.39)	0.21	(0.4)	0.16	(0.37)
Medical insurance	0.34	(0.48)	0.35	(0.48)	0.33	(0.47)
Self employed	0.09	(0.28)	0.06	(0.24)	0.13	(0.34)
Family number in SH	2.31	(1.25)	2.28	(1.19)	2.36	(1.35)
Self-identity	0.59	(0.49)	0.60	(0.49)	0.58	(0.49)
migrantidentity1	3.21	(1.17)	3.25	(1.17)	3.14	(1.17)
migrantidentity2	3.37	(1.08)	3.43	(1.08)	3.27	(1.07)
Migrantidentity3	2.69	(1.06)	2.68	(1.08)	2.70	(1.03)
Intrinsic	4.45	(1.37)	4.43	(1.37)	4.49	(1.39)
Extrinsic	0.83	(1.21)	0.84	(1.21)	0.82	(1.2)
Anticipation	4.25	(0.74)	4.25	(0.74)	4.25	(0.75)
Labor income	2.72	(1.09)	2.85	(1.14)	2.52	(0.97)
Other income	1.66	(2.06)	1.69	(1.99)	1.62	(2.18)
Average income	6.58	(1.96)	6.56	(1.98)	6.60	(1.93)
Remittance(1000 CNY)	0.54	(0.68)	0.88	(0.67)		

附表 A.2 OPM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不含寄回	含寄回	变量	不含寄回	含寄回
Remittance		0.102** (0.052)	Migrant identity1	-0.035 (0.036)	-0.033 (0.036)
Age	-0.050 (0.031)	-0.049 (0.031)	Migrant identity2	-0.011 (0.039)	-0.017 (0.039)
Age Sq.	0.001 (0.000)	0.001 (0.000)	Migrant identity3	0.087** (0.034)	0.088** (0.034)
Female (d)	0.124* (0.074)	0.129* (0.074)	Intrinsic	0.028 (0.035)	0.028 (0.035)
Married (d)	0.238** (0.121)	0.208* (0.122)	Extrinsic	0.059 (0.04)	0.058 (0.040)

Divorced (d)	0.625** (0.248)	0.582** (0.249)	Anticipation	0.182*** (0.046)	0.182*** (0.046)
Years since in SH	0.028 (0.019)	0.030 (0.019)	Labor income	0.076** (0.033)	0.062* (0.034)
Years since in SH Sq.	0.000 (0.001)	0.000 (0.001)	Other income	0.013 (0.019)	0.007 (0.020)
Number of jobs	-0.066*** (0.020)	-0.066*** (0.020)	Average income	0.007 (0.018)	0.007 (0.018)
Only child(d)	0.168* (0.100)	0.177* (0.100)	/CUT1	-1.783	-1.744
Years of Education	-0.024* (0.013)	-0.023* (0.013)	/CUT2	-1.463	-1.422
General insurance (d)	0.139* (0.083)	0.127 (0.083)	/CUT3	-1.077	-1.036
Urban insurance (d)	0.297*** (0.084)	0.290*** (0.085)	/CUT4	-0.760	-0.718
Rural insurance (d)	0.088 (0.090)	0.086 (0.09)	/CUT5	0.082	0.125
Medical insurance (d)	0.051 (0.074)	0.046 (0.074)	/CUT6	0.632	0.676
Self Employed (d)	0.089 (0.127)	0.102 (0.127)	/CUT7	1.115	1.160
Family Number in SH	0.054 (0.034)	0.069** (0.035)	/CUT8	1.849	1.896
Self-identity (d)	-0.394*** (0.071)	-0.400*** (0.071)	/CUT9	2.142	2.189

附表 A.3 各因素的边际效应一览表

变量	各因素的边际效应(%)									
	1	2	3	4	5	6	7	8	9	10
Remittance	-0.26	-0.28	-0.54	-0.64	-1.99	-0.47	0.56	1.76	0.63	1.23
Age	0.13	0.14	0.27	0.32	0.98	0.23	-0.28	-0.87	-0.31	-0.60
Age Sq.	0.00	0.00	0.00	0.00	-0.01	0.00	0.00	0.01	0.00	0.01
Female*	-0.33	-0.36	-0.69	-0.83	-2.59	-0.65	0.69	2.29	0.83	1.64
Married*	-0.61	-0.63	-1.17	-1.35	-3.92	-0.70	1.32	3.58	1.22	2.27
Divorced*	-0.80	-0.99	-2.07	-2.74	-10.83	-5.27	0.20	8.12	3.98	10.40
Years in SH	-0.07	-0.08	-0.15	-0.18	-0.56	-0.13	0.16	0.50	0.18	0.34
Years in SH ²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Jobs	0.16	0.17	0.33	0.40	1.22	0.29	-0.35	-1.08	-0.39	-0.75
Only child*	-0.39	-0.44	-0.85	-1.04	-3.43	-1.02	0.77	2.95	1.13	2.32
Education	0.05	0.06	0.11	0.13	0.39	0.09	-0.11	-0.35	-0.12	-0.24
General ins.*	-0.32	-0.34	-0.66	-0.79	-2.48	-0.63	0.66	2.19	0.80	1.57
Urban ins.*	-0.71	-0.76	-1.45	-1.73	-5.41	-1.35	1.45	4.77	1.74	3.45
Rural ins.*	-0.21	-0.23	-0.45	-0.54	-1.71	-0.45	0.44	1.50	0.55	1.10

Medical ins.*	-0.12	-0.13	-0.25	-0.30	-0.94	-0.23	0.26	0.83	0.30	0.59
Self-emp.*	-0.25	-0.28	-0.54	-0.65	-2.09	-0.58	0.51	1.82	0.68	1.37
Family in SH	-0.19	-0.21	-0.39	-0.46	-1.43	-0.34	0.41	1.27	0.46	0.88
Selfidentity *	0.97	1.04	1.98	2.37	7.43	1.91	-1.93	-6.52	-2.41	-4.85
Migrantid1	0.09	0.10	0.18	0.22	0.67	0.16	-0.19	-0.59	-0.21	-0.41
Migrantid2	0.03	0.04	0.07	0.08	0.26	0.06	-0.07	-0.23	-0.08	-0.16
Migrantid3	-0.22	-0.24	-0.46	-0.54	-1.67	-0.39	0.48	1.49	0.53	1.03
Intrinsic	-0.06	-0.07	-0.13	-0.16	-0.48	-0.11	0.14	0.42	0.15	0.30
Extrinsic	-0.14	-0.15	-0.28	-0.34	-1.03	-0.24	0.29	0.92	0.33	0.64
Anticipation	-0.44	-0.48	-0.91	-1.08	-3.33	-0.78	0.95	2.96	1.06	2.06
Labor income	-0.14	-0.15	-0.29	-0.35	-1.06	-0.25	0.30	0.95	0.34	0.66
Prob.	0.93	1.25	2.85	4.16	22.03	21.12	18.24	19.32	4.26	5.84

附表 A.4 OLS 回归结果

变量	不含寄回	含寄回	变量	不含寄回	含寄回
Remittance		0.178** (0.091)	Medical insurance (d)	0.091 (0.481)	0.082 (0.074)
Age	-0.085 (0.055)	-0.082 (0.055)	Self Employed (d)	0.157 (0.223)	0.181 (0.127)
Age Sq.	0.001 (0.001)	0.001 (0.000)	Family Number in SH	0.093 (0.059)	0.118** (0.035)
Female (d)	0.225* (0.130)	0.232* (0.074)	Self-identity (d)	-0.673*** (0.123)	-0.683*** (0.071)
Married (d)	0.413* (0.212)	0.361* (0.122)	Migrant identity1	-0.067 (0.063)	-0.062 (0.036)
Divorced (d)	1.021** (0.430)	0.940** (0.249)	Migrant identity2	-0.020 (0.068)	-0.030 (0.039)
Years since in SH	0.050 (0.034)	0.053 (0.019)	Migrant identity3	0.158** (0.060)	0.160** (0.034)
Years since in SH Sq.	0.000 (0.001)	0.000 (0.001)	Intrinsic	0.045 (0.061)	0.046 (0.035)
Number of jobs	-0.115*** (0.034)	-0.115*** (0.020)	Extrinsic	0.101 (0.070)	0.098 (0.040)
Only child(d)	0.272 (0.175)	0.288* (0.100)	Anticipation	0.306*** (0.081)	0.305*** (0.046)
Years of Education	-0.043* (0.023)	-0.041* (0.013)	Labor income	0.127** (0.058)	0.103* (0.034)
General insurance (d)	0.243* (0.145)	0.222 (0.083)	Other income	0.021 (0.034)	0.010 (0.020)
Urban insurance (d)	0.527*** (0.148)	0.514*** (0.085)	Average income	0.012 (0.031)	0.011 (0.018)
Rural insurance (d)	0.144 (0.158)	0.141 (0.09)	Constant	5.471*** (1.055)	5.396*** (1.055)